

假作真时真亦假

——清末民初第一部伪译侦探小说揭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齐金鑫 中山大学 | 李德超 香港理工大学

摘要：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繁荣，代表了时人对侦探小说这种“舶来品”的欢迎程度。通过研究清末民初第一部侦探小说的翻译，本文发现，从语言风格、体裁特征、叙述手法等文本内因素和文本外因素分析，该作品应属伪译之作。侦探小说这种异域文学体裁对于当时社会而言属于异质文化，为了能将其引入，张坤德按照传统叙述结构、以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文学规范的语言，名为翻译、实为创作了这篇侦探小说。这与当今普遍认为伪译者会偏离目的语文学规范、夸大源语文本特征相冲突。本研究发现有有助于我们了解伪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形式和途径，并有助于建构关于伪译这种特殊文学及文化现象的翻译理论。

关键词：侦探小说翻译；伪译；文学体裁；文学规范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9) 06-0042-10

对于“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fictitious translation)或称“伪译”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至 Popovič。他认为伪译是指“以翻译面目对外呈现，实则为原创文本作品，目的是利用读者期待，赢得更广泛读者群”(1976: 20)。其后，Toury 从目的语文化角度出发，认为所谓翻译(作品)，即为目的语文化中存在的事实，从而将伪译概念引入现代翻译研究版图。他把伪译定义为“不存在相对应的原文文本，因此没有实际上的‘语言转换操作’和翻译关系，但是却以翻译名义呈现的文本”(Toury, 1995: 40)。表面上看，伪译似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但是根据 Toury 的描写翻译理论，“任何话语、现象以及产生这些话语和现象的各种过程，只要在目的语文化中以翻译面目示人或被视作翻译”(Toury, 2012: 27)都应该是翻译研究的对象，此即 Toury 声称的“假定翻译”(assumed translation)。

对于伪译成因及作用，Toury (1995: 40-42)认为，在文化意义上，一些文本以译本形式出现，便于向该文化输入新介质，以翻译名义出现，可以减少对新介质的反对声音，尤其是在封闭保守、墨守成规的文化之中，因为人们对译作往往有更大包容度。另外一个原因是作家试图引入新介质甚至是文学体裁时，打着翻译旗号往往受到的审查更宽松。跟创作相比，翻译作品对既有文学或文化规范的偏离会受到更多包容，即使出现问题，也可将罪名归咎于那个虚构的作者，从而逃避惩罚。

从语言和创新角度来看，Toury (2005: 4-6; 2012: 50)认为，伪译会刻意夸大(伪)源语文本特点，这样则不会有人怀疑该译作的真实性。作者可以在伪译中体现出自己的文学观点或主张，以此来变革现存文学体系甚至创造出全新的文学体裁。伪译有时也与作家先前文学主张或者文学实践有关。某些

作家在某个时期想要进行新的文学尝试，但是又不想让该尝试跟自己名字联系起来。一旦该尝试失败，假翻译之手，可以不至于损害自己既得名声。伪译往往产生于处于从属地位或者地位比较“低”的文化和语言中，所谓源语文本，来源于处于主导地位或地位更“高”的文化和语言。

一、国内外伪译研究综述

Toury (1995/2005) 认为伪译研究不应该处于翻译研究、文化研究边缘，而应结合历史背景考察伪译现象，把其看作一种“文化建构”现象。Venuti (1998) 认为伪译可以向某个文化中输入新颖的东西，包括文学形式和主题，此文学形式或主题在该文化中可能不存在或者暂时处于边缘地位。因伪译会掩盖作者身份，这必然会让人们重新思考对于作者身份的定义。Apter (2005) 认为翻译是从原作生命那里克隆过来的后续生命，而伪译则将翻译伦理从忠实转向文本再生的各种条件。Rambelli (2006) 研究了18世纪意大利小说家如何通过伪译来建构作者身份。小说家们想要推动的文学体裁在当时的意大利被认为毫无价值，伪译则可以让小说家推动该文学体裁的同时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Tahir-Gürçağlar (2008) 通过研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晚期夏洛克小说的伪译发现，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事情节和推理的简单化，缺少幽默感以及文学特点的缺失是夏洛克小说伪翻译的共同特点，这都与原作有很大不同，作者认为这与当时奥斯曼帝国通俗文学创作重视改写 (rewriting) 相关。Rizzi (2008) 认为现有关于伪译的研究将伪译和真译视作互相排斥的两个概念，一个文本要么是伪译，要么

是真译，但是伪译和真译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可以并存的。作者结合内文本 (peritexts) 和外文本 (epitexts) 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发现在文本中伪译和真译是同时存在的。Palumbo (2009) 则认为我们可以从伪译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读者接受方式等方面开展研究。伪译是引进新文学体裁的方式，对处于转折期的社会而言，伪译还是社会和文化变革中的有力武器。

国内较早研究伪译的学者当属孔慧怡。孔慧怡 (1999) 在其书中设章专门讨论伪译现象，通过对佛经疑经、伪经、《景善日记》和20世纪末的两个伪译个案的探讨，认为个别人士将自己的作品假托其他文化中的古人或者伪冒异国珍稀古籍文本，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假借权威或稀有之名，达到宣传效应。童亮 (2002) 介绍、评论了西方伪译本研究经历的两个主要阶段，并呼吁译界应该对伪译展开积极、广泛的研究，丰富我国翻译理论。胡翠娥 (2003) 通过调查晚清翻译小说中的伪译和伪著发现，虽然伪译 (著) 是后世研究者考证得出的结论，但是在创作之时，它们被作者有意充当译作 (著)，被读者当作译作 (著) 来接受，因此，它们对该国文化和文学的演进起到了相同作用。刘敬国、项东 (2010) 考察了佛经中的伪译现象，认为伪译产生原因有两个：译者的选择和经文中蕴含的政治因素。潘少瑜 (2011) 认为初出茅庐的周瘦鹃借伪译打开了创作空间，发展新小说文类，并试图藉由伪翻译小说来推广特定的道德价值。张道振 (2013) 考察了一个伪译案例，发现社会对伪译的阅读和接受展示了文化转型阶段中国读者对翻译的接受和生产模式。

以上研究都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对伪译的

认识。但是伪译现象是否还存在其它文化和文本特点？以通俗文学形式出现的伪译作品与以严肃文学或其它非文学形式出现的伪译作品是否存在区别？侦探小说作为清末民初接受最早、最受欢迎、翻译最多的小说体裁，在最初引进中国时，是否存在着伪译现象及特点？对这种通俗文学体裁伪译的研究，无疑能够丰富我们在中国语境下对伪译这一特殊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认识及理论建构。

本文将考察清末民初第一部翻译侦探小说，分析其文本内容，并与同一译者的其他翻译侦探小说相比较，指出这部翻译侦探小说实为伪译的原因，并考察译者背后动机，以丰富在描写翻译学框架内对伪译的研究，深化其理论内涵并指出伪译对于翻译研究的启示。

二、清末民初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

在晚清小说中，“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的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阿英，1996：210）。亦有学者称，“近代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学首先是从小说开始的，而在西方小说中，接受最早、理解最快的是侦探小说，在侦探小说译述方面，又以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为大宗”（邹振环，1996：249）。晚清翻译小说的发展极大推动了创作小说的繁荣。

由于历史及文化原因，中国历来没有侦探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唯一比较相似的是公案小说。公案小说体现的是清官断案，案件结果往往由清官来决定；侦探小说体现的是证据的搜集，逻辑的推理，案件结果往往由证据来决定。林纾在1906年写的《〈神枢鬼藏录〉序》中写道：

中国无律师，但有讼师；无包探，但有

隶役。讼师如蝇，隶役如狼。蝇之所经，良哉亦败；狼之所过，家畜无免……近年读海上诸君子所译包探诸案，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才，则人人将求致其名誉，既享名誉，又多得钱，孰则甘为不省者！下民既免讼师及隶役之患，或重观清明之天日，则小说之功宁不伟哉！（转引自阿英，1960：237）

林纾对中西律师讼师、包探隶役之褒贬跃然纸上，期望通过侦探小说的翻译可以达到改良社会、涤荡污浊之目的。

在《〈中国侦探案〉弁言》中，中国老少年（吴趼人）（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1997：213）谈到：

访诸一般读侦探案者，则曰：侦探手段之敏捷也，思想之神奇也，科学之精进也，吾国之昏官、贖官、糊涂官所梦想不到者也。吾读之，聊以快吾心。或又曰：吾国无侦探之学，无侦探之役，译此者正以输入文明。而吾国官吏徒意气用事，刑讯是尚，语以侦探，彼且瞠目结舌，不解云何。

可见在当时读者心中，侦探小说是全新事物，通过翻译此类小说，读者了解到了西方侦探独到之处，希望通过侦探小说的翻译，输入此文明，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这是因为“晚清以来所引进的西方侦探小说，不仅仅只是一个新的小说品种，而且象征着全新的正义观念和法律系统。”（赵稀方，2012：37）

三、实为伪译的中国第一篇侦探小说译作

不少研究者（蔡祝青，2016；郭延礼，2001）认为，晚清中国侦探小说的译介，肇始于张坤德翻译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以下简称《奇案》）。该翻译载于1896

年8月9日《时务报》第一期之上。《奇案》推出后,受到读者追捧,《时务报》又陆续刊登了张坤德翻译的4个侦探故事,皆有原文可寻,作者为柯南道尔,肇始了晚清对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译介。

1907年《月月小说》谈及侦探小说时指出,“吾国译本,以曩时《时务报》张氏为最先,尔后续译者接踵而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1997:272),此张氏即为张坤德。张坤德,是中国清末民初翻译家,浙江桐乡乌镇人,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他曾在袁世凯手下担任朝鲜釜山领事馆翻译兼副领事。1895年,任《马关条约》清政府日文翻译。后来黄遵宪将张坤德聘为《时务报》英文翻译。《时务报》创刊之初主笔为梁启超,是戊戌维新时期宣传维新思想最有力、影响最广的刊物,是维新派人士推行变法新政的主要阵地。

《时务报》当时专门辟有“域外报译”专栏,翻译刊载国外报刊文章,《奇案》即发表在此专栏。《奇案》注明译自《伦敦俄们报》(此报在《时务报》中只出现一次,其他外报则反复出现),但是原作不详,原作者也不详。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在其编写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也将该作视为“原作不详”(樽本照雄、贺伟,2002:29)。在现有研究中,由于没有对应原文,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此文时,都只能把它当作译文描述。作为中国第一部翻译侦探小说,本文将对比其与同时期、同一译者其他译作的特点,结合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因素,从译作的语言风格、体裁特征、叙述手法等方面展开讨论,指出该作品实为伪译,并探讨其文化及文学意义以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奇案》主要讲的是一英国富翁怀疑医生

与其年轻美貌的法国妻子有私情,并预谋加害他,因此来找包探探查此事。其第一段摘录如下:

前数年时,英伦敦包探公所,忽来一人。其容若病,其语若疑,其意似不乐,其衣服似富人。良久,乃自言曰:“我嗃子生也,以商致富。今老矣,将罢商。以家资大半,售钱而居此。我壮犹鰥,近年行境外,遇法国女子,始娶为妻。虽年不及我之半,然同处甚惧我之罢商而归。以妻劝也,而曰:‘我近日身常不快,顾不之病所从来’。幸前在境外遇一医,名喀迭者,为我治之。此医术深,然美男子。年时来伦敦,自创医院。顾与我妻亦素识者,而待我妻甚周。我妻从前踪迹,我未能悉知之,此岂有故耶!虽然,亦何至是,且无可征验。询之能鉴别之医,亦谓汤药无误。然我病不久辄深,且极速,恐遂不救。幸勿扬,为我遣精细之探,察之。”

之后张坤德翻译了第二本侦探小说《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以下简称《密约案》),讲述有一天Watson接到曾经的同学来信求助,然后他和Holmes去拜访那位同学,从其口中得知在外交部任职的他把重要的海军协定丢失了。第一段摘录如下:

英有攀息(名)翻尔向斯(姓)者,为守旧党魁爵臣呵尔黑斯特之甥。幼时尝与医生滑震同学,年相若,而班加丁滑震二等。众以其世家予文弱,颇欺之,蹴球则故掷球其身以为乐。然性敏慧,馆中课高试辄高列,得奖赏最多。后学成人大书院,已而仕外部,以有才又得舅之援,故每得差遣。后其舅为外部大臣,又典升转,部中有要事,无不与闻。

以下是《密约案》原文名为“The Navy Treaty”中的原文:

During my school-days I had been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a lad named Percy Phelps, who was of much the same age as myself, though he was two classes ahead of me. He was a very brilliant boy, and carried away every prize which the school had to offer, finished his exploits by winning a scholarship which sent him on to continue his triumphant career at Cambridge.

通过将《奇案》和《密约案》相对比发现以下值得关注之处:

1) 同样是包探,“歇洛克·呵尔唔斯”(Sherlock Holmes)、“滑震”(Watson)中文译名在《密约案》中是第一次出现,在《奇案》中并没有使用,而是一直使用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包探”、“探伙”。

2)《密约案》中出现大量外来事物和词汇,读起来充满异域风情,如“加非”(coffee)、“撮香生意”(stock)、“炮此卯斯”(Portsmouth),而《奇案》中除了谈到几个国家,如法国、西班牙、印度外(见表1),无任何异域特色,即使除去这些外来词汇并不会对文本的理解有任何影响。《奇案》文本中充斥着中国风情,在描写富翁死时其住所“门悬麻”;在描写女子美丽时,只是“韶秀弱西班牙美人”,使用了中国形容女子的传统词汇“韶秀”来一笔带过;女子哭泣时“以手掩面而泣”。而在《密约案》中描写欧洲女性时,译者忠实把原文女子形象译为“见其身矮而壮,面如橄榄,睛黑如意大利人,发黑如漆,面色如霞”,对其身材、面部特征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很难想象《奇案》与《密约案》发表时间间隔很短,在《奇案》广受欢迎之际,张坤德的翻译策略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张坤德在《时务报》的翻译策略,似乎可以从以下事例中窥见端倪:在《时务报》第34册开始刊登的由张坤德翻译的《会审信隆租船全案》一文,“连载不止(34-68册),时甫未几,《时务报》的读者对这篇译文颇有意见,认为‘译报语太繁’,所以‘不甚愿看’”(潘光哲,2005:73)。《时务报》回应:“近数期报后所译《会审信隆租船全案》,皆系照西字报译出,无一言增减……非敢如涂涂附取充篇幅也”(《时务报》第38册,419页),从此可见该报对翻译的立场总体来说是希望能尽量忠实于原文。在详细分析了张坤德早期翻译侦探小说后,孔慧怡(1999:45-48)也发现他“(的翻译)是唯一试图打破中国传统女性典型规范的例子”、“在试图保留英语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积极。”因此,《密约案》的翻译符合上述论断,而《奇案》则不符合。《奇案》中还有其他可疑之处,比如在谈到喀迭医生杀人手法时,谈到“用针刺眼鼻二孔……系用针蘸毒药,从脊梁放入以杀之”,讨论的是中国针灸、穴位之术,如果存在对应的英语原文,似乎说不通。

表1《奇案》中体现异域特色的词汇

词汇或短语	出现次数
(英)伦敦	5
印度(毒草、药)	3
(法)巴黎	2
香港	2
境外	1
西班牙	1
得(德)律风	1

3) 西方侦探小说在创作时,喜欢采用倒叙的方式,先讲述犯罪事实,然后悬念一步步揭开直到最后侦探破案。侦探小说的最大特点,在于侦探一步步揭露犯罪分子和犯罪动机,而在揭露的过程中处处充满着意外和

悬念 (Humpherys, 2017: 2)。然而《奇案》和《密约案》写作手法都尽显中国小说之特点。正如知新室主人(周桂笙)在其“《毒蛇圈》译者识语”中谈到的“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陈平原、夏晓虹, 1997: 111)。《奇案》开篇即讲述主人翁之姓氏、来历、事迹,完全符合中国小说体裁写作手法,由于该文本没有对应原文,因此无从考证该手法跟原文的关系。《密约案》也将故事叙述结构作了很大变化,原文中的滑震第一人称叙述改为中国读者熟悉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视角。原文结构本来是: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很优秀,毕业后去了外交部工作。我某日突然接到他的来信,在信里他表达了自己最近的困境,听说我和歇洛克交往甚密,特来求救。于是我和歇洛克一同去拜访这位同学,这时他才告诉我们原来存放在他那里的秘密的海军协定被人偷走了。而在《密约案》里,由于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原文中的“我”——滑震只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存在,原文的倒叙在这里成了顺叙。文章开头先介绍滑震同学生平,然后又详细论述了海军协定被偷走,他卧床不起,后回忆起与滑震同学之情,遂写信求助于滑震,接下来写破案过程。这完全与柯南道尔原文顺序相反。显然,张坤德在翻译时将小说倒叙手法变换为顺序手法,使之更符合当时读者阅读习惯。

自第三篇翻译小说《记伧者复仇事》(以下简称《复仇事》)起,歇洛克、滑震等译名得以继续沿用,题目也不再使用有中国特色的“包探”,该译文对于异域事物或风俗也通过加注的方式,让读者知悉。在这一点上,与《密约案》相似。这也符合上文提到的张

坤德的翻译策略,因此张坤德从一开始翻译侦探小说,即尽可能保留原文中的陌生化词汇,通过解释、加注等方式,让读者感受异域风情。该译文仍然为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原文中的“我”变成译文中的“滑”,译文第一句添加了原文所没有的“滑震又记歇洛克之事云”,但是基本保留了原文的叙述顺序。

在之后《继父诬女破案》(以下简称《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以下简称《被戕》)中,则完全保留了原文视角和结构安排,以“余”来讲述。《破案》开头如下:

余尝在呵尔唔斯所。与呵据竈觚语。清谈未竟。突闻叩门声。

《被戕》开头如下:

余友呵尔唔斯,夙具伟才,余已备志简端,惜措词猥芜,未合撰述体例。兹余振笔记最后一事,余心兹戚。盖自第一章巧验红色案起,至获水师条约案止,即欲辍笔,不复述最后之一事,诚以提论此事,使余哀怆。时逾两纪,犹未慊也。

4)《奇案》篇幅短小精悍(2653字),《密约案》长度近10,000字,与接下来他的三篇侦探小说翻译文本长度相当。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中,对话占有很大篇幅,有时证据的获得即依靠对话,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从对话中得以展现。从《密约案》开始,原文中的对话虽有所删减,但对话仍然占有很大篇幅。而《奇案》中对话很少,故事情节的推进主要依靠的是论述者的讲述。

5)通过分析发现,《时务报》中依次出现的柯南道尔的作品并非按照原文实际出版时间翻译,加之《密约案》和《复仇事》署名“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和“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撰”,《破案》和《被戕》的署名分别为“滑震笔记”和“译滑

震笔记”，因此《时务报》上所译文章并非直接来自英国的 *The Strand Magazine* 杂志，而是翻译自 1894 年出版的《回忆录》(*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从字面上看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可以翻译成“歇洛克呵尔唔斯回忆录”。如果不了解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或并不了解文章中“I”(滑震)和主人公福尔摩斯并非一人，加之侦探小说读起来像是纪实类小说，与笔记体很相似，是可能会将其翻译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后面译者可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因此在翻译《复仇事》时，特别署明“此书滑震所撰”，之所以后期改为“滑震笔记”，则是由于这些小说皆是以滑震的视角讲述的，因此译者又误以为是“滑震笔记”。

基于以上文本内和文本外因素分析，我们可以基本推断，《奇案》并无对应的原文文本。但译者张坤德在创作这篇译文的时候，很有可能读过或听过柯南道尔侦探小说，因为《奇案》中有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影子。比如，除了探长自身外，还有“探伙”，有“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影子。正如蔡祝青(2016: 117)谓之“从内文来看，则是一篇充满福尔摩斯探案风格的侦探小说”。很大可能是，译者在读到柯南道尔作品时，被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但又记不起详细细节，特别是里面的对话，因此按照自己脑海当中的想象，结合中国的一些元素，通过使

用异域词汇的方式，创作了《奇案》这本小说，但是其故事情节以及包探探案方式又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不同，因此注明是翻译。

与真译有对应的单个文本不同，伪译的参照物往往是“外文文本的合集，或是从合集中可抽取的模型”(abstractable model)(Toury, 2005: 6)，有可能是“多个源文本，甚至多种源语语言”(Toury, 2012: 95)。从《奇案》这个例子来看，该伪译虽然没有单一的对应该文本，但是其对应文本为译者脑海中侦探小说的模型的大致形象，加上译者自己脑海中所想象的侦探小说。

陈平原、夏晓虹(1997: 8)认为清末民初“各种杂志、书局纷纷刊载、出版翻译小说，以至竟有不少作家假译本之名而创作(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纯为增加销路)。”胡翠娥(2003: 73-74)总结当时伪译产生的原因，认为晚清时期伪译的产生，首先是因为不能靠八股取士的闲散文人以翻译为生，其次译本的丰厚稿酬促使他们借翻译之名博取名利。当时著作与译作之间存在着销行差价，其根源在于当时的读者对于国人耳熟能详的创作小说没有特定兴趣，而对反映国外新鲜事物和风俗的翻译作品兴趣浓厚，这都为伪译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时务报》当时发行量巨大，除了其政治立场鲜明之外，其刊登的具有特色的域外小说，似乎也增加了其对平民大众的吸引力。正如潘光哲所言，在吸引

表2 《时务报》刊登的侦探小说一览表

题名	连载时间	原文出处
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	《时务报》第1册(1896.08.09)	《伦敦俄国报》
英包探勘盗密约案	《时务报》第6至9册(1896.09.27-10.27)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刊登于英国 <i>The Strand Magazine</i> 1893.10-11 月期)
记假者复仇事	《时务报》第10至12册(1896.11.05-11.25)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刊登于英国 <i>The Strand Magazine</i> 1893.07 月期)
继父姘女破案	《时务报》第24至26册(1897.04.22-05.12)	A Case of Identity (刊登于英国 <i>The Strand Magazine</i> 1891.09 月期)
呵尔唔斯缉案被戕	《时务报》第27至30册(1897.05.22-06.20)	The Adventure of the Final Problem (刊登于英国 <i>The Strand Magazine</i> 1893.12 月期)

读者多样化方面，“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应该是多元复杂的”（潘光哲，2005：61）。从侦探小说这种体裁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而言，第一篇伪译侦探小说能够发表在这样一份有分量的报纸上，在客观上推动了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造成了后期中国侦探小说翻译的热潮。

Toury 所认为的，伪译者为了让自己实际上的创作看起来像是翻译，会在创作文本中夸大“源语文本”的语言文体特征。然而通过分析《奇案》的语言特征，发现译者仅是使用一些具有异域特色的词汇来告知读者此文本乃翻译文本，该文本语言特征仍是符合彼时中国的文学和语言规范，几乎没有原文的痕迹。Toury（2012：50）认为伪译的发生，总是暗示着“有意的从属行为”（a deliberate act of subordination），即从属于一个更有“声望”（prestigious）、更“重要”（important）或者更“强势”（dominant）的文化。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很难说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会认为中国文化地位从属于西方文化，或是处于劣势地位。孔慧怡（1999：25）也认为“20世纪初的小说译者并没有收到忠于原著这类思想规范的影响，也不觉得自己就译作而言所占的地位比原作者低。”中国侦探小说伪译的产生应被视为填补当时中国文化或文学中的某些空白，即侦探小说对当时中国读者而言是一种崭新的阅读体验。

伪译观点认为，为了引进某种异质文化，伪译者会偏离既有文学规范。孔慧怡（1999）认为小说要想普及不能违反特有的标准和规范，但是小说，特别是翻译小说要想成为拯救社会的良方，首先要吸引到一群

读者，在建立新的标准和规范之前，也要让人接受这些标准和规范，认为它们有吸引力才行。通过对张坤德早期侦探小说翻译的分析发现，译者在刚开始引进侦探小说这个全新的体裁时，无论是伪译《奇案》还是真译《密约案》，与形式上的偏离（比如叙事结构）相比，更多的是内容上的偏离。只有在发现目标读者对内容接受之后，译者才逐渐把原文与中国传统迥然相异的叙事方式忠实再现出来。先解决“讲什么”，然后再处理“怎么讲”，这种在当时新小说作家常遇到的问题（陈平原，1989：12-13），看来在当时的翻译人员之中同样可以见到。只不过我们看到，新小说的创作要突破形式上的桎梏需要经年的努力，而翻译从重内容、轻形式至两者都重视，所用时间显然短的多。以张坤德的侦探小说翻译过程为例：在张发表于1896年的伪译及第一篇福尔摩斯译作之中，他均摒弃西方侦探小说中典型的第一人称限定视角，改用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自1896年底至1897年发表的其余三篇福尔摩斯译作之中，这种特殊的侦探小说叙事方式就完全保留了下来。这种先内容、后形式、循序渐进的通过翻译（及伪译）引进新的文学形式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译者一开始即偏离目的语文化中的叙述模式，其接受度必定大打折扣。而内容上的偏离，即侦探小说中所述情节与内容，虽然在目的语文化中不存在，但显然，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对于内容的偏离接受度远大于形式的偏离。因此，就侦探小说的翻译而言，伪译更多体现的是内容上的偏离，待读者熟悉此内容与情节后，继而出现形式上的偏离，至此侦探小说这种体裁方为读者所接受。

四、结语

本文通过调查清末民初第一本侦探小说译本的文本内外因素,认为其极有可能为伪译。在翻译引进侦探小说这种全新的体裁时,如果一开始即完全按照原作的叙述结构等特点翻译,会与中国传统叙事规范作正面冲突,引起读者疑惑(孔慧怡,1996),因此译者先是按照当时文学规范,名为翻译实则创作了一篇侦探小说《奇案》。但为了减少社会、特别是文学界对这种新体裁的阻力,宣称其为翻译作品,且按照当时文学规范进行创作,测试读者对于侦探小说的反应。甫一发表即受到读者欢迎后,随即翻译了《密约案》这本真正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确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翻译侦探小说首先借由伪译引入中国,伪译时先借由中国既有叙述结构,实现内容上的偏离,待读者接受后,继而完全按照侦探小说视角和叙述结构翻译,实现形式上的偏离。诚如 Even-Zohar (1990: 46-48) 所言,当目的语文学体系中存在着“文学真空”(literary vacuums)时,外国文学模式就很容易趁虚而入,这时翻译文学在目的语多元文学系统中即会占据“中心位置”(central position),积极参与目的语多元系统中心的建构。伪译之后风起云涌的侦探小说翻译及创作即印证了这一点,也由此确立了侦探小说这种全新的文学体裁在当时中国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地位。

当然,若将来真发现有相关原文的存在,我们对《奇案》是伪译的判断则被推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伪译的存在和研究的价值。正如卢志宏、张雯(2011)谈到的,译介和传播的最终决定力量是该译本能否在目的语系统中发挥应有作用,译本一旦产生就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一个文本在不同的

文化体系里运作,就有不同的定位……就会相应地衍生出不同的面貌和生命。”(孔慧怡,1999: 201)因此,无论是真译本还是伪译本,都应该具有研究价值,都应该是翻译研究所关注的,不能仅仅因为是“伪”的、“假”的就置之不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翻开历史故纸堆,结合历史背景,深入挖掘考察伪译的原因及影响等,这都会让我们对伪译本所处时代,以及译者或作者所起到的作用有更深入认识。

一种新文学体裁在目的语系统中的移植和接受让我们对整个世界文学体系之中,各文学体裁此消彼长的过程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而联系时代背景深入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则可以让我们对当时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有更全面的了解。伪译则为我们了解这些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通过逐步还原伪译文本的历史背景,将其“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Touy, 2012: 23),可达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果。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伪译在引进某种文学体裁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借翻译之名引进某个新文学体裁比如侦探小说,可以试探目的语文化对该体裁的接受程度,即使尝试失败,创作者也可将其归咎于那个不存在的“作者”。张坤德的尝试成功了,由此拉开了侦探小说在中国译介以及创作的序幕,造成后期“侦探小说热”。

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以及目的语中的文化事实,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翻译研究界应有的关注。翻译界长期以来将“忠实”、“对等”等概念视为圭臬,因此在规定性(prescriptive)翻译研究中,伪译很难获得应有的重视。描写性(descriptive)则突破了“忠实”、“对等”等藩篱的束缚,极大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伪译虽然表面看不

是真正的翻译，但却打着翻译的旗号，由此证明翻译可以实现其他“非翻译”实现不了的功能，而且时人也将其视作翻译，伪译发挥的是翻译的功能和作用，反映了当时翻译在目的语多元系统文化中的地位。1898年《清议报》刊载梁启超翻译日本政治小说，特别是1899年林纾翻译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时文人学士趋之若鹜，待到1902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创

刊起即宣布“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1903年创刊的《绣像小说》以及1904年创刊的《新新小说》都宣传译作和著述参半（转引自陈平原，1989：28），这都彰显了翻译小说的受欢迎度，使得翻译小说迅速确立起在中国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可见当时的翻译小说的地位并非边缘，而是超越原创文学，这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伪译的产生，并在引进新小说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

- [1]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0。
- [2] 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3] 蔡祝青·接受与转化——试论侦探小说在清末民初（1896-1916）中国的译介与创作[J]。跨文化流动的吊诡——晚清到民国，2016（46）：111-146。
- [4]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5]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6]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7] 胡翠娥·不是边缘的边缘——论晚清小说和小说翻译中的伪译和伪著[J]。中国比较文学，2003（3）：69-85。
- [8] 孔慧怡·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J]。通俗文学评论，1996（4）：24-36。
- [9]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0] 刘敬国、项东·经典化和政治化——一部汉语佛经的诞生[J]。中国翻译，2010（4）：24-27。
- [11] 卢志宏、张雯·伪译现象对于翻译的启示[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93-98。
- [12] 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J]。历史研究，2005（5）：60-83。
- [13] 潘少瑜·想象西方：论瘦瘦的[伪翻译]小说[J]。编译论丛，2011（2）：1-23。
- [14] 童亮·伪译本：透视翻译功能与本质的一个视角[J]。外语研究，2002（3）：61-65。
- [15] 张道振·伪译的成因、功能和现代变异[J]。外语教学，2013（1）：99-103。
- [16] 赵稀方·翻译与文化协商——从《毒蛇圈》看晚清侦探小说翻译[J]。中国比较文学，2012（1）：35-46。
- [17]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 [18] 樽本照雄、贺伟·新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2。
- [19] Apter, Emily. Translation with No Original: Scandals of Textual Reproduction[A]. In S. Berman & W. Michael (eds.). *Nation, Language,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C].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9-174.
- [20]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Studies[J]. *Poetics Today*, 1990, 11(1): 1-268.
- [21] Humpherys, Anne. British Detective Fiction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OL].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2017-06-27) [2019-02-08]. <https://oxfordre.com/literature/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01098.001.0001/acrefore-9780190201098-e-240>.
- [22] Palumbo, Giuseppe. *Key Te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9.
- [23] Popović, Anton. *A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Z]. 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76.
- [24] Rambelli, Paolo. Pseudotranslations, Authorship and Novelists in Eighteenth-Century Italy[A]. In H. Theo (ed.). *Translating Other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81-210.
- [25] Rizzi, Andrea. When a Text Is Both a Pseudotranslation And a Translation[A]. In A. Pym, M. Shlesinger & D. 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8: 153-162.
- [26] Tahir Gürçaglar, Şehnaz. Sherlock Holmes in the Interculture: Pseudotranslation and Anonymity in Turkish Literature[A]. In A. Pym, M. Shlesinger & D. 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8: 133-152.
- [27]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28] Toury, Gideon. Enhancing Cultural Changes by Means of Fictitious Translations[A]. In E. Hung (ed.).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Studies in History, Norms and Image-projection*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5.
- [29]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
- [30]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作者简介 齐金鑫，香港理工大学在读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史、实证翻译研究。

李德超，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史、实证翻译研究、口译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 qjinxin@mail.sysu.edu.cn; dechao.li@polyu.edu.hk

The Metaphorical Truth in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By *LIU Jia*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p.16

Abstract: Drawing on Ricœur's research on metaphor's mechanism for semantic renewal and Nietzsche's view of the metaphorical nature of truth,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three stages in which metaphors employed in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have worked in the post-Nietzschean context to reveal "true facts" in translation. Stressing the objectivity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FER metaphors have first diverted our attention from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notion of imitation to an interest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that results in the unveiling of "the truth of the original." Putting emphasis up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features of the translation context, the SYSTEM metaphors have then rendered visible the historicity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whereby "the truth of history" is disclosed. And finally, by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globalized and a Eurocentric thinking about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metaphors have led to the valuation of the invisible translators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textual remainders as well, thus unmasking "the truth of differences." After pursuing this line of inquiry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mentioned abov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a further development could be the unveiling of the rhetorical truth behind translation and the uncovering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in differences in general.

Keywords: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metaphor; semantic renewal; truth

In-Betweenness as a Mode of Metacognition to Fre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Obsession with the Substantiality/Nihilism Opposition

By *YANG Zhenyua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China) p.23

Abstract: Metacogni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s currently torn between a tendency to emphasize its substantiality and a simultaneous one to stress its intangibility. Whereas the affirmation of some values of translation adds to the metacognition's substantiality and reinforces its theoretical borders, the postmodernist undermining of these values tends however to deny its theories of any real existence. This paper advocates an in-between mode of metacognition as a way to fre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obsession with the substantiality/insubstantiality binary opposition. It argues that transcending such an obsession would help to avoid either the rigidity of the borders between different theories or the bewilderment resulting from a denial of theories' ontological status. It would also help to promote a dialectical sublimation for achieving a more productive metatheoretical stanc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substantiality; nihilism; obsession; in-between metacognition

Corpus-bas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ew and Outlook

By *LI Deju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China) p.30

Abstract: The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pioneered by Mona Baker, has since its launching become a new paradigm in itself. Among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t has mad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S is the grounding of the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 The corpus-based DTS has two foci of research: translation universals and translator style.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what the corpus-bas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achieved, from fruitful explorations of "the third code" and the "translator fingerprint" to enlightening discus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yle and ideology. The review is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existing researches, evaluating them in terms of the scope each allow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universals or translator's style.

Keywords: corpu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 translation universal; style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 style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First Pseudo-translated Detective Story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By *QI Jinx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 *LI Dechao*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42

Abstract: The boom in publication of translated detective stori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in China reflects the popularity of this new literary genre at that time. What has been reputed as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 detective novel, however, turns out to be a pseudo-translation upon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its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textual features. Zhang Kunde, its alleged translator, actually composed the story by himself to introduce this novel literary genre to China. And he pseudo-transla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target text” conforms to the linguistic and poetic norm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t that time. This finding is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the belief that pseudo-translators would tend to deviate from the accepted literary norms of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o exaggerate language features of the presumed original texts (Toury 2012). In addition to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pseudo-translational work’s formal features and generic identity, the finding also helps us to come to firmer grips with pseudo-translation as a special literary phenomenon in the target culture.

Keywords: translation; detective fiction; pseudo-translation; literary genre; literary norms

Wing-Tsit Chan as a Diasporic Translator and His English Rendition of *Ch’uan-hsi lu*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By LIU Kongxi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China) p.52

Abstract: Chinese American philosopher Wing-Tsit Chan had done much in promoting Chinese philosophy abroad ov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in particular to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works. His translations faithfully convey the originality and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their academic value had won him high reputation as a scholarly translator.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distinction Chan has been able to enjoy is due largely to his cultural identity as a diasporic translator. Taking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uan-hsi lu*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a diaspora-engendered cultural awareness on his choice of translation material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rowing light in particular on the cultural capital he had accrued as a diasporic scholar, and the strong influence he was able to exert in applying the capital to the practice and promotion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Wing-Tsit Chan; diasporic translator;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cultural awareness; cultural capital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Marxist Text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By FANG 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61

Abstract: Marxism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rough indirect and fragmentary Chinese renditions of Marxist texts carried by the missionary-sponsored publication *Wanguo Gongbao* (*Multinational Communique*) and via the book *Da Tong Xue* (*A Theory on the State of Great Unity*).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rxism’s translation-enabled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calling attention through textual comparison to how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translators concerned tended to be affected by the then prevailing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Among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are: that the initially introduced idea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re the result of a double selection by both the authors of the source texts and their translators; that the mode of translation adopted by pioneering Chinese translators of Marxist texts tends to show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translation; an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as in these translations is of much significance to Marxism’s localization in China.

Keywords: Marxism;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China; translation selection; translation influence

Interpreting Technologi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cepts, Influences and Trends

By WANG Huash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 YANG Chengshu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China) p.69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presentation of interpreting technologies has created much confusion among learners, educators and practitioners alike, and is hence in substantial need of a